

台大歲月——入學

朱永德, 53 歷史

我是 1948 年 10 月到臺灣的。那年六月我從西南聯大附中畢業。可是到了臺灣，大學入學考試已過。當時國府大敗退，轉進臺灣開始未久。但在濟南戰役之後，紅軍已從游擊戰改為陣地戰。處處情勢大亂，我則兩頭未能考大學。脫了一年。次年雖較穩定，然而人心刃是惶惶。其時當年北大五四健將傅斯年方任台大校長。從大陸撤退到台的各大學名教授大多集中在台島。加之從青年軍退伍，拼命讀書的青年，也處處皆是。而全台只有四所大學。除台大外，僅省立師院，農院，和工院分別在臺北，台中，台南。但當時考入台大，對我個人來說，有幾件值得記憶的事。

第一：當時入學只考四門課。文科史學系。考國，英，數之外，第四門專科是考“歷史”，以總分 200 分錄取。考完後，我心裡一直有些忐忑不安。但放榜時，我不但錄取了，且名列前茅。心中多少有些不解。待收到正實通知時，方知公佈之錄取名單，非按考試分數也。我的總分是 199.5，故是‘四捨五入’被錄取的。怎能不謝謝上帝？開學後，我的國文，英文分組雖都較次。但在班上，我的表現，尚不錯。那個時代的好學生，大多去了理工學院。除了‘四捨五入’，還有其他變通補助之法。結果是文法科的好學生較少。我讀的歷史系，相反的，名師就很多了。有從清華北大來的，也有從中大和中究院來的。那有如此的巧事呢？

第二：此外，在校還有不少“職業學生”。當然其時左派右派都有。小蔣的救國團尚未進入大專校園。但學校生活管理組的工作人員，青一色是保密調查局的人物。這只能說是為了當時臺灣內部的穩定。也是“白色恐怖”的一環罷了。故同時進台大的前後兩班同學中，在校四年內，被抓去吃公糧的，如今我還能叫得出名字的，至少有四，五位之多。到了李登輝時代，平反白色冤案，這些浪費青春的友朋們，個個都拿到一筆可觀的現款，至少我知道三位，足以在海外購置房產。

第三：當我錄取了台大，有一位近親送了一本英文書給我。書不難讀也很有趣。這是 Dale Carnegie 寫的“*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*”。此書的第一版 1936 年就出版了。是鼓勵人採取行動的一本書。在美國一直很風行。後來也翻譯成多國文字。我在上完大一時才把整本書（英文版）讀完，並非常受這本書的鼓勵。故第二年，一開學，我就找各種機會來實習。其時歷史系同班

只有二十來個人。第一次開級會選班代表。我未費吹灰之力，就被選上了班代表。到了全校學生代表聯合

會開會時，選代聯會正副主席，情況就有點不同了。我居然當選了副主席。當選主席的是中文系三年級的羅錦堂。他後來是臺灣第一個‘土產博士’，是元曲權威。今在夏威夷大學退休，任榮譽教授。我每經過夏威夷，總與他見面敘舊。

我所以特別提這件事，是因此後在大學的兩三年中，凡有中英文的演講比賽，辯論比賽等。我總報名參加。每次多少總能拿到點獎品。以至在宿舍床頭的牆上，到畢業時，貼滿了獎狀。這個重點的轉移，可說對我一生的生活和職業都有很大的影響。

首先，我在台大畢業時，四年總分平均剛過 80，在班上應是名列前幾名的。但畢業後，我報考台大厲史研究所時，有教授說，“朱某不是做

學問的人”。這就成為沒被錄取的因素之一。其實這個觀察一點沒錯。我出國後雖在加大柏克萊分校得的碩士，哥倫比亞大學得的博士。但一生大著，一本都沒有。可是各種會長，頗有幾個，包刮紐約州的亞洲學研究學會會長（全國亞洲研究學會理事），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創會會長，世界二戰亞太史實維護會會長等。這些事務到了現今這個年齡，並不是特別用來自我吹噓的，只不過說明當年進台大時一個特別的經歷，對我一生所產生的長遠的影響而已。如今想起這一連串，也可加強一點“夕陽無限好”的感受罷了！